

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形成及其本土化建构

齐金花

内容提要 幻觉现实主义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给莫言创作风格的一个术语,强调了莫言是位凭借敏锐的想象力在主观感觉中打造文学现实世界的作家。但这个幻觉现实主义与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有所不同。莫言小说以民间的创作立场,悲悯的现实情怀,在传承本土的和外来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中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使幻觉现实主义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格局,更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更富有本土特色的民族品质。

关键词 莫言 幻觉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 本土化

齐金花,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225009

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 以下称HR)是西方上世纪七十年代首见于德国诗歌批评的一个术语,1981年作为一种超现实主义风格收录进《牛津20世纪艺术词汇大全》,定义为“精细正确的细节描绘,但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描述外部现实,而是用现实手法描述梦境和幻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运用这个术语指称莫言的创作风格,引发世界关注。比之于一般意义上的幻觉现实主义,两者虽都强调从主观感觉出发生成相应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来表现现实,然而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与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还是有所不同。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里核心在“幻境”,现实主义是艺术手法,而莫言的创作核心是“现实”,他是把现实置于梦境和幻想之中进行描述,梦境和幻想是莫言用来表现现实的艺术手法。而更显著的是,莫言将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揉进了“梦境”和“幻想”之中,使幻觉现实主义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格局,更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更富中国特质的格调。本文旨在论述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形成以及具有本土化特质的艺术特点。

一、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的形成

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在与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对抗”中破茧化蝶。在莫言所受到的外来文学影响中,马尔克斯的影响最为突出,甚至被冠以“中国的马尔克斯”。回顾其创作历程,马尔克斯启发了莫言在两个创作方向上的探索:一是回归自己的血地故乡,一是在叙事中求“奇”。当年读了

十八页《百年孤独》的莫言猛然意识到“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居然全世界的文学读者都能接受,都愿意接受,这使我想到我也可以写自己家乡的生活,……”^[1]这个转向促成了他围绕山东高密建构自己的文学王国,据此书写民间的历史。自《白狗秋千架》始,莫言所有的佳作皆生发于此。关注莫言作品民间叙事的陈思和曾分析过:“……当他(指莫言)企图效仿拉美作家创作‘魔幻’时他不自觉地开掘了民间的创作源泉。”^[2]即将民间的、历史的经验都熔铸于小小高密这片乡土中,将中国百姓赖以生存的如土地、婚姻、生养等根本问题与战争、政治、经济的变革交汇呈现出来,凭借“人的高度”^[3]走向了世界文坛。在求“奇”中发掘平凡事物间的不平凡联系,成为莫言幻觉现实主义审美艺术的源头活水。他总结道:“《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4]这种方式吸引了莫言展开对本土传统文学现代化和对外来文学本土化的建构。此间他经历了模仿与重构,同时也走出影响,走向了独立。初期有颇具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爆炸》、《球形闪电》、《金发婴儿》等尝试,也有《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中探索出的经由感觉放大的声、色、味,以及物与人的通灵所制造出的超现实幻觉美学,掀起学界以“新感觉”为焦点的讨论,这些新感觉与西方幻觉现实主义存在心有灵犀的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莫言逐渐将自己“经验里面类似的荒诞故事”^[5]搬入文学,中国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以及文革语境下的非理性现实统统被纳入到他的梦境与幻想中,以更夸张的想象,更神奇的荒诞通过意象、语言、叙事等艺术形式投射进自己对现实批判的主题中,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这些突破或者说追求自我风格的努力逐步让莫言由幻觉现实感觉踏上幻觉现实主义的塑形之路。

寻求挣脱马尔克斯影响的莫言,其幻觉现实主义塑形因置身在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从一开始便比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有更大的格局。它表现在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不像西方幻觉现实主义常表现困疾境遇下人潜意识生发的超现实意象,而是将民间的、历史的和现实都植入普通人的经历体验中并生成独特的美学风格。如揭示人性欲望的《怀抱鲜花的女人》中对女人的诡谲幻想,批判人在物欲横流社会中堕落的《四十一炮》对色食性的遐想,《酒国》里人的理性被酒精摧毁后本能的样态描摹等等,都是莫言创作技巧实验过程中“个性化的、不落他人窠臼的努力”。至2000年,莫言认为这是他风格走向成熟的分野。《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一批举世公认的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6]的好作品相继问世,显示了他“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能力”^[7]。这种能力用他的话说是以“大踏步的撤退”的方式“追求真正的民间风格,语言上追求民间口语、戏剧的特点,与那种追求优雅的文学不同”^[8]。《檀香刑》创作中他推翻已写的“带有魔幻现实主义味道”的5万字,让本土朴实的猫腔掌控故事的氛围;《生死疲劳》则是以“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魔幻小说”^[9]向马尔克斯致敬。两部力作都以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架构,中国传统的魔幻元素润染出社会心理现实,用中国古老的戏曲、音乐、绘画美学装点中国格调,构成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媲美的艺术风格。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就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解释说:“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

[1]莫言、杨扬:《小说越来越难写了》,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南京》《钟山》2001年第5期。

[3]莫言:《文学与时代》,《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刊)2012年第2期。

[4][7]莫言:《故乡的传说》,邱华栋选编《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第7页。

[5]莫言:《先锋 底层 民间》,《广州》《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6]莫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济南》《大众讲坛》(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第1期。

[8]莫言:《檀香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18页。

[9]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1]他在客观评价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影响的同时,充分揭示了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的原创基因。

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在中国本土文化传承中找到了其个性特色的生发点和动力源。出身齐鲁文化腹地,齐鲁文化的“刚健”、“爱国”、“救世”、“民本”、“人道”、“创造”等精神^[2]滋养了他的天性,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他从村民田间地头口耳相传的聊斋故事里与蒲松龄结缘,奉他为宗师,曾创作过颇具中国魔幻色彩的《夜渔》、《马语》、《战友重逢》等故事,被阿城赞为写魔幻“当代中国一绝”^[3]。年少时东鳞西爪读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让他学到了中国魔幻、史传叙事和章回体结构、说书人即兴干预等文学技法,成为《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力作中的经典格调。所以张清华认为“莫言身上的魔幻色彩,他小说中的神奇,和他所在的山东齐国一带的民间文化、民间思维方式是有内在联系的。……”^[4]。另一方面如《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山乡巨变》、《苦菜花》等红色经典的影响,让那种高歌猛进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成为留存在他作品中的一股活力,一种霸气。在人们追问魔幻现实主义对《红高粱》的影响时,他直言那是“红色经典的影响”^[5]。

当然,二十年的农村生活让他谙熟民间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思维方法、人际关系模式和语言特点。在恰逢时代文艺思潮转向民间的大势下,这些经验让他置身民间立场,一部五十万字的《丰乳肥臀》竟在不到九十天的时间从容完成,可见其对民间题材游刃有余的把控力。当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涌入时,莫言已具有了依托本土传统嫁接西方现代叙事技巧的视野和能量,以及建构自己个性审美体系的基础和能力。就这样,这方水土陶冶出的性情与混杂吸纳的文学素养与时代潮流的作用让莫言选择追求一种民间的、个体的,同时又是梦幻的、现代的写作手段,并进而形成莫式幻觉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

二、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的本土化建构

首先,将中国传统诗学“幻”与“真”的时空逻辑与现代叙事方法相融交汇。作家一方面传承了中国传统诗学中“幻”与“真”分界的时空建构,让真(即现实)是幻的起点,又是幻中故事演绎的逻辑,两个空间的人与物在事件突转中交汇,以此撬动情节转折,成就对现实的隐喻。这是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分野,也是与西方幻觉现实主义的差异所在。马尔克斯运用原始思维解读日常生活,使魔幻成为寄居于现实本身的肌理性存在,所以会有作家的“社会现实主义者”^[6]和读者眼中的魔幻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莫言运用现代叙事的间离效果,丰富了叙事的层次,升华了现实主题的高度。多个叙事人的限制视角或一个叙事者的全能视角,乃至不同叙事人称的转换,将历史与现实,故事中的人与故事外的人都密切联系起来,对同一段现实的共时和历时理解与判断沿着各自的感性逻辑延伸出来。以《生死疲劳》为例:西门闹轮回幻境里的驴、马、猪、狗、猴由最后投生为人的蓝千岁以第一人称讲述,

[1]吴永熹:《诺奖评委会前主席:中国官员试图贿选完全是胡说》,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0/24/c_123862399.htm。

[2]张友谊主编:《鲁商文化与齐鲁文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3]阿城:《闲话闲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4]张清华:《莫言小说特质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2012年10月24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2/2012-10-24/144720.html>。

[5]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上海〕《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6]〔哥〕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朱景冬译《二百年的孤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页。

并存的人世现实由参与者蓝解放讲述,结局由见证者“作家莫言”讲述。三个叙事者解读了同一段历史时空:轮回动物视角看到的是“比人的更逼近真实的现实”^[1],牠们看到了脱下伪装面具的人;蓝解放看到的是民间个体感受的现实;“莫言”看到的则是旁观者眼中的现实。前两者是历史的,也是故事的,而“莫言”则是故事中的,也是故事外的,更是和读者站在一起的。蓝千岁的讲述构成轮回与读者的间离,蓝解放的讲述构成历史与读者的间离,而莫言的讲述再构成整个故事与读者的间离,所以幻界的现实和故事的真实最后经过故事里的“莫言”走向历史的现实,现实的真实,以及对历史变迁中人的价值的深层反思。这样的幻觉从未让读者像阅读《百年孤独》那样迷失于魔幻,更不会脱离小说的主题。在微观层面,来自中国魔幻元素建构的幻界内,作家让人性与动物本性时而合一,时而分离:合中感慨人世的牵绊和诱惑、情义和情欲的纠结,分中体验肆意的狂欢、简单的自由,以此将时而“象”中、时而“象”外之东方美充分释放出来,突破了西方幻觉现实主义的审美格调,每个叙事者给出主观体验中感受到的主客观交织的现实,此中从客观见传统现实美,从主观见幻觉现实美。让这部从“蒲松龄的《席方平》那学来”^[2]的故事框架经莫言的审美现代化重构后,成为凸显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美学的经典之作。

其次,将西方文学的心理叙事融入本土史传叙事。莫言青睐中国史传叙事传统,其长篇小说往往都以宏观历史时空定位故事的现实语境,再运用外来文学技巧拓展兼具中西美学意境的心理时空,最后形成以历史时间为主轴,以轴上某点发端,枝叶横生地漫射出多个心理时空维度的现实。这样既有厚重的现实底蕴,又有灵动的幻觉律动,更有形散而神不散的主题吸附力。《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都是物理时间定位的经典案例。物理时间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在强化文学真实的同时,也为演绎心理时空之“幻”安排好了收发归宿。《红高粱》开篇以“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奶奶”为“我爷爷”等人送行去伏击日本鬼子这个历史时间轴上的点开始散射,心理时间先跳转到现代,“我”与现在的村民们谈论这场战争及其主人公的传说;然后闪回战斗前日本鬼子的入村暴行;接着追溯了“我”爷爷奶奶的爱情;最后呼应开头走向战场的厮杀。叙事者心理时间从未脱离开篇时间主轴,所以散射出的次单元叙事都能让读者寻着现实逻辑拼出故事的全貌。这个特点即使是心理时空恣肆的作品也依然清晰。以《欢乐》为例,物理时间定位在主人公从家到翠翠坟前自杀,心理时空却囊括了主人公过去二十五年的苦闷:高考的失败,梦想的破灭,家境的贫困等等,这些意识和潜意识中的郁积让他崩溃,以致选择死亡来逃脱。文本形式上的一万六千多字的巨大段落,从物理上量化了压抑的重量和宣泄的指数。现实的“真”和主观想象的“幻”彼此难分地在主人公的主观感觉里发酵,与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手法不谋而合。可见心理时空无论怎样像气球样膨胀,但短暂的物理时间依旧会将它牢牢系在现实的手中,散乱的情感宣泄不会妨碍读者理解主人公悲催命运的现实成因。但遗憾的是理解这种从主观世界流淌出的集内在感觉现实与外在客观现实相交融的幻觉审美现实世界,需要特定的时代背景认知支撑才能理解其隐喻的大美,所以会制约其跨文化传播,这也是莫言作品英译者葛浩文印证了的事实。

其三,将民间说书人的即兴评说化为有温度的叙事干预为主题导航。上文已提及作家通过叙事视角制造的间离、叙事结构的离散将幻觉牢牢抓在现实手中,但如何促成由作品反思社会问题,完成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莫言通过他多样化的叙事干预来达成。这种干预立足民间立场,以举轻若重的态度抒发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站在变革时代的潮头选择解构传统,以多义代替唯一,表现民间的多

[1]莫言:《文学个性化刍议》,〔北京〕《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2]莫言:《莫言之言(一)——从学习蒲松龄谈起》,〔太原〕《金牌读写》2012年12期。

元性、多样性特点。为此平民身份的“我”，同名“莫言”介入的叙事干预，挑动起以民间的生存观向精英文化、正统体制挑战的狂欢，为整个叙事腔调平添一丝民间的随性与诙谐。干预者的功能重在强化故事与现实的联系，促成历史与现在的认知对照，让历史中曾有的严肃与僵化经过时间的过滤，淘出恒久的真善美价值。情绪干预如《红高粱》中现代青年的“我”讲到“我奶奶”不到六岁缠脚时，便发出“打倒封建主义！”^[1]的愤怒。分析干预如《高粱酒》中运用的“文化道德”、“‘正当’途径争取财富”、“人生观”^[2]等现代话语品评“我爷爷”从良民成为匪首的转变。爱情母题中设计出“狂热的、残酷的、冰凉的爱情=胃出血+活剥皮+装哑巴”^[3]这样机械的公式，陌生化人们的常规认知和话语模式。

此外故事中的“莫言”干预则更别具深意。他在客观上密切了作家本人与作品的联系，使得作品中的“莫言”与作品创作者莫言真假难辨，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生死疲劳》中“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既是国庆日，又是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成立的日子，那天，也是莫言那小子出生的日子”^[4]。由此开始，全书前四部53章中“莫言”出现在46个章节中，且第五部由“莫言”讲述，他时而以作品中的作品形式作为某些场景的记录者，时而以插科打诨的角色起承转合，或铺设迷局、或揭示秘密，轮回之中以他的不变完成幻觉与现实的转换。《酒国》中的作家“莫言”，与充满文革式激进批判话语的酒博士一放一收，把控话语的平衡，且在结尾处现身酒国，最终这个“莫言”的意志在酒国沦陷而再次警示腐败力量的巨大。还有反映了作家深度的价值判断干预。《檀香刑》中对官府酷刑功能的解读，实际在道出历史中看客、英雄与酷刑制造者间如戏人生的感慨，引导读者避免在顺向的文学性和逆向的现实性之间发生逻辑误读，从而忽视民间生存的残酷性。《红蝗》结尾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分析：“人吃人，人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5]所有这类表达都从以恶为人性本源的哲学观出发，传递作者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也使这样的干预点睛主题，延伸哲学思考的张力，让这些作品经得住时间的砥砺。

最后，在粗放张扬的荒诞与纤弱细腻的诡谲语言中见惊世绝俗。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社会繁文缛节众多，人民情绪内敛含蓄，莫言的创作语言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断突破传统限制的底线为幻觉现实开拓伸展灵性的空间，赢得自己狂欢的领地。二十年农村田间地头的生活让他积累了驳杂的民间语言形式，阅读到的“红色经典”、“文革文体”、民间说唱和口头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作品的译介语言都化入他的艺术词典，据此置身于民间与精英话语的中间地带。他个性化地拼装嫁接，解构重构，最终找到以狂放不羁的荒诞和纤弱细腻的诡谲的两极语言走势安放他的幻觉现实主义。首先，粗狂张扬的荒诞是莫言对自己亲历的文革话语模式的艺术运用。失真的夸张、泛滥的煽情、盲目的忠心、疯狂的赞美、狂暴的贬低，为莫言提供了一种现成的颇具现代性特征的叙事狂欢话语模板。他采用戏仿、杂糅、拼接解构、颠覆、重塑语义，让高雅跌入民俗，正统走向异端，严肃走向诙谐。如戏仿楚辞体的“苍狼啊苍狼生蛋四方，鸣声如狗叫行动闪火光，此鸟非凡鸟啊此鸟是神鸟，口衔灵芝啊筑巢于龙香，得见此鸟啊避祸消殃，得见此鸟啊万寿无疆”^[6]；戏仿评论话语的“妖精现实主义”“严酷现实主义”；戏仿政治话语“化流氓为高尚，化肉欲为艺术，化粮食为酒精，化悲痛为力量”^[7]。其次，将传统语境下的雅与俗、正与反、乃至来自不同时代的语义符号杂糅使用，凸显多义性。正反义杂糅如《红高粱》中“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

[1][2][3]莫言：《红高粱》，《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第94页，第270页。

[4]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5]莫言：《红蝗》，《食草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6]莫言：《马驹横穿沼泽》，《食草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页。

[7]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跨时代杂糅如《生死疲劳》中西门闹话语中的“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和“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1]《白棉花》中“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则将价值完全背离的意蕴熔铸在一起,一反纯粹的赞扬和批判的语义表达,凸显以复杂多义还原民间多元性的真实意图。其三,将传统禁忌的话语搬进文学殿堂。《红蝗》中,大便成为高频词,能“联想到印度的瑜伽功和中国高僧们的静坐参禅……”;《战友重逢》中,“尿”能生发出一种男人生命与自然相通的美感:“在我与河水之间也立即架起了一弧袖珍的彩虹”^[2];暴力在莫言的想象中的复原,从割下的罗汉大爷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得瓷盘叮叮咚咚响”到《檀香刑》中钱雄飞的凌迟,孙丙的檀香刑达到了巅峰,一次次冲击读者的审美底线。更有荒诞至魔幻境界的如《生死疲劳》中的文革场景:“宣传车开过来了,……(车上的)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3]“那个姑娘对着麦克风喊叫,……陈光第不但思想反动,而且道德败坏,多次与一头母驴通奸,致使那头母驴怀孕,……”^[4]这样非理性现实中的话语在现代派理念的观照下推动人们跳出文本的荒诞与幽默,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去深思荒诞背后的危害。而莫言语言的另一极是纤弱细腻的,氤氲着诡谲的唯美气息,它通过感官将周遭环境感觉化,汇成一场感官狂欢的盛宴,绘出一幅虚实相生的超现实影视立体画面,既有中国道家的洒脱,又蕴含西方潜意识深处的幽深晦暗,从更深层次解读了人性的现实和人的灵性美。《红高粱》中临死前的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朦胧的眼睛里,……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5]。《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拔萝卜时能听到萝卜的细根与土壤分开时发出“水泡破裂”样的声响。《球星闪电》里的男主角自己是一只飞行的蝴蝶在空中看到湖面“开放着花朵般的白雾”,听到“雨点撩拨芦苇的声音和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四十一炮》中饥饿的罗小通听到“兴奋的跳蚤撞击你的皮肤啪啪作响”。《丰乳肥臀》中描写落在河里的炸弹:“缓缓地升起一根水柱,那水柱有牛腰那么粗,升到河堤那么高时,顶端骤然散开,好像一颗披头散发的银柳树”等等^[6],彰显了莫式美学的形、意、韵融合,最终妆点成就了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的精美大厦。

结 语

综上所述,凭借敏锐的想象力在主观感觉中打造文学现实世界的莫言,不仅仅借鉴了西方幻觉现实主义所关注的人在困疾境遇下由潜意识生发的超现实意象,而且将民间的、历史的和现实都植入普通人的经历体验而生成别样的小说美学,投射出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成就了更大的艺术格局;民间立场所承载的广阔自由的创新维度,让莫言在本土传统和西方借鉴来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技法中构建自己的幻觉艺术美学体系,探索出更丰富的表现现实的艺术手法,回归厚重的齐鲁文化血地创作。守持中国特质的格调是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存在基因,这让莫言有远离马尔克斯这些先辈们的觉悟,有创作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7]作品的追求与自信,并从这里将中国的历史风云和人间百态推向全世界读者的视野,由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时代引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坛。

[责任编辑:平 啸]

[1][3][4]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第132-133页,第133页。

[2]莫言:《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276页。

[5]莫言:《红高粱》,《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6]莫言:《丰乳肥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7]莫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济南〕《大众讲坛》(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第1期。